臺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
2006 年 12 月，頁 219~270

BIBLID1012-8514(2006)38p.219-270
2006.9.27 收稿，2006.12.11 通過刊登

柏林與史家論「道德判斷」
——兼談二十世紀英國史學的若干發展

林　慈　淑*

提　要

本文擬由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史學觀念入手，探索柏林如何與史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卡耳（E. H. Carr, 1892~1982）論證「道德判斷」，並兼而論及「歷史」之義。文中將藉由他們對「道德判斷」問題的歧見和爭論，一方面觀看柏林與當代史家的互動往來、他在當時的「歷史」定位；一方面也由此考察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發展的若干現象，甚至追溯這些現象的來龍去脈，譬如「道德判斷」議題的發展、英國史學中「文學的歷史」和「科學的歷史」兩股勢力的爭逐與消長，以及英國史學專業的走向。

關鍵詞：以撒・柏林　道德判斷　英國史學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言：柏林曾是「歷史學家」
一、柏林論歷史
二、柏林與巴特菲爾德的相遇
三、英國史學中兩種理念之爭
四、柏林與巴特菲爾德論「道德判斷」
五、柏林與卡耳之間
六、卡耳批判柏林的「道德判斷」說
七、柏林與卡耳的「歷史」之戰
結論：柏林不再是「歷史學家」

前言：柏林曾是「歷史學家」

在今天的學術界中，可能很少人會認為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一名歷史學家。

柏林以自由主義與西方觀念史的研究而聞名於世，他對於「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分論迄今仍為許多學者樂道，他對於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的探索也仍然是理解此思想範疇的重要之作。許多人眼中，柏林是二十世紀英國的「思想家」或「政治思想家」，至於歷史界也少有人會把柏林視為同行。例如在休・沃仁頓（Marnie Hughes-Warrington）所編的*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一書內，[1]華雪（W. H. Walsh, 1913~1986）、歐克秀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 1990）、蓋伊勒（Pieter Geyl, 1887~1966）、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卡耳（E. H. Carr, 1892~1982）等，這些與柏林同時代，甚至曾與柏林論證歷史或曾評論柏林史觀的學者都名列榜上，[2]柏林卻獨漏於其中。但是，柏林的

1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2 柯靈烏和柏林同屬牛津哲學圈，後來都以歷史方法研究哲學。蓋伊勒（Pieter Geyl）曾

確曾在二十世紀中葉自視為歷史學家，並積極護衛自己的史觀。

柏林受教於牛津大學的哲學系統，1940 年代末期，他毅然捨棄哲學，而投身觀念史範疇。[3]儘管當時英國學界對觀念史研究普遍冷漠以待，1950 年代之後柏林仍努力耕耘出一片天地。他從追尋俄國思想文化的特色，到勾勒十八世紀以及近代西方思想的輪廓脈絡，為這一思想領域留下許多出色的作品。[4]不僅如此，柏林對於歷史這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問題，也不吝建言。從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柏林在多篇文章如：〈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現實意識〉（"A Sense of Reality"）、〈刺蝟與狐狸〉（"Hedgehogs and Foxes"）以及〈科學的歷史〉（"A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中，暢談他如何看待當代史學發展的走向、歷史學家的工作與責任、歷史與科學的關係等問題。[5]在這些篇章內，柏林不斷訴諸「歷史學家」之名，以歷史學家自居，絲毫未見任何勉強之處。而當時出版的歷史哲學文集，如 1959 年梅爾霍夫（Hans Meyerhoff）所編的《我們時代中的歷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6]即在「歷史與道德」（History and Philosophy）這個綱目下收錄了柏林〈歷史的必然性〉一文，此多少反映出柏林在當時人心中的「歷史」定位。甚且從 1950 年代開始，柏林挑戰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的「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

為文討論柏林的〈歷史的必然性〉一文，參見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Groningen: J. B. Wolters, 1955), 264-271. 卡耳和柏林曾為好友，後來和柏林因為歷史理念不同而筆戰。

3 關於柏林從純哲學研究走上觀念史領域的因由，參見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2005，臺北），362~369。

4 關於柏林在二十世紀中葉有關觀念史方面的作品可以參見的中譯本如：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臺北：聯經，1987）；彭淮棟譯，《現實意識》（臺北：臉譜出版社，2004）；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5 參見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57~406。

6 Hans Meyerhof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說，更與卡耳進行辯論，為自己的歷史信念而戰。1965 年時，他甚至自我解嘲說：自己的教席雖是政治哲學，但其實更像一個歷史學家。[7]

以上種種，顯見柏林認同「歷史」之深。奇特的是，迄至 1970 年代，柏林與「歷史」的關係似乎有了變化。他在 1979 年所寫〈民族主義〉一文的最初和最末，兩次宣稱自己「既非歷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8]之後在 1991 年，柏林接受雷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 1961~）的訪問時，也仍然向世人宣告「我不是個歷史學家」。[9]柏林的幾度聲明似乎有意澄清自己非歷史學家之「事實」，試圖拉開自己與歷史之間的距離。而這樣的態度與他在二十世紀中葉，尤其 1950 年代時的積極擁抱歷史，不可同日而語。

這一前一後的轉變耐人尋味。看起來柏林的自我定位前後有了重大的分歧，柏林是否在 1970 年後感覺自己與歷史愈行愈遠？如是，其中的關鍵是來自個人興趣的轉移？或者更是受到外在學術趨向遷移的影響？

遺憾的是，上述有關柏林學術傾向的主觀與客觀定位的轉變，並未能從柏林個人的文字著述中獲得梗概，學者的研究中也未見相關的討論。而這些問題所以引發個人探究的興趣，主要基於這一假設：個人的認同不可能純屬心理的作用，柏林的自我認定應該多少受到外在學術環境的牽動。他從「認同歷史」到「遠離歷史」，可能與二十世紀歷史學領域的變動不無關係。

然本文並非要直接探究柏林與歷史學關係轉變的「原因」（過程），這個問題所涉及的背景可能相當複雜，[10]現今恐怕尚無充分證據足以推

---

7 邁克·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臺北：立緒文化，2001），398；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London: Vintage, 2000), 261.

8 以撒·柏林著，馮克利譯，〈民族主義〉，《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423。

9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思想的瀚海》（臺北：正中書局，1994），126。

10 個人以為，柏林與歷史漸行漸遠，可能也與他所從事的「觀念史」在「歷史學」領域中的地位變動有關。二十世紀中葉後，觀念史逐漸被歸於「哲學」範疇，而在歷史學中則

論其中的因果。但可以先行探究的是，柏林自我定位的改變，甚至他所遭遇的某種「歷史」窘境，與當時英國史學「專業化」趨向的關係，而他與卡耳之間的歷史之爭也可能是值得留意的重大轉折。

本文擬由柏林的史學觀念入手，探索柏林如何與史家巴特菲爾德、卡耳論證「道德判斷」與「什麼是歷史」。文中將藉由他們對「道德判斷」問題的歧見和爭論，一方面觀看柏林與當代史家的互動往來、他在當時的「歷史」定位；一方面也由此考察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發展的若干現象，甚至追溯這些現象的來龍去脈，譬如「道德判斷」議題的發展、英國史學中「文學的歷史」和「科學的歷史」兩股勢力的爭逐與消長，以及英國史學專業的走向。

目前有關柏林的研究中，專注於他的政治和自由主義思想者多，但探討他的歷史思想和史學淵源者極少。不過，柏林確確實實曾經自認為是歷史學家，也曾豪氣干雲地與史學同輩論說歷史，只是「歷史」的潮流似乎離他越來越遠。柏林與卡耳辯論時曾如此慨嘆：「只有勝利者的聲音才值得傾聽」，或許，在史學巨輪轆轆前進中，柏林不屬於那「勝利」的一群，以致於他和歷史曾有的交會也被人忽略、遺忘了。然而檢視這段過程，也可見證英國史學專業化之路上若干人事的起與落。歷史畢竟不該只是記錄「勝利者」的聲音。

一、柏林論歷史

自 1950 年起，迄 1960 年為止，柏林共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1950）、〈歷史的必然性〉（1953）、〈刺蝟與狐狸〉（1953）、〈現實意識〉（1953）、〈歷史與理論：科學史的觀念〉（“History and Theory: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1960）等數篇文章，[11]其中

被涵蓋面更廣的「文化史」所取代。

11 關於 1950 年代最能代表柏林史學思想的文章，James Cracraft主要以〈二十世紀的政治

〈歷史的必然性〉、〈刺蝟與狐狸〉、〈現實意識〉更先後出版於 1953 和 1954 年間，且都是改寫自演講稿。從柏林一生的寫作紀錄來看，這幾篇論述堪稱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歷史思想代表作，此後，他幾乎不曾再如此密集、費心地議論歷史。這數篇文字因此是瞭解柏林歷史思想的重要媒材。

從發表時間相近這一點來推論：這幾篇文章雖各有論述重心，應也會有某些相關的主題貫穿其間，以及一些前後延續的理念脈絡。[12]細查柏林生平最為人熟知的基本信念是：個人並非完全受制於社會或任何個人以外的力量的箝制，歷史中的個人必然擁有著程度大小不等的自由。[13]在這些篇章中，此一信念的的確確不斷浮現。然而，柏林並未自限於此，他欲在這個基石上，形塑一套關於「歷史」的學說。

柏林在這些作品中所闡明的歷史問題，殆可歸納出以下五個要點：

（一）史家的道德判斷

在柏林看來，個人既然多少都擁有選擇的自由，則對於歷史上的種種現象與發展，個人身在其中，難辭其責。正因為「自由」與「責任」的相對關係，柏林堅信面對過去時，後人應該予以「公正」的判斷，這

理念〉（“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歷史的必然性〉、〈現實意識〉以及〈科學的歷史〉四篇文章為代表，但本文認為 1953 年發表的〈刺蝟與狐狸〉亦屬同系列之作，也應該歸入代表之列。見James Cracraft, “A Berlin for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 Middletown Conn.), 277-330.

12 例如，Aviezer Tucker以柏林〈科學史的觀念〉這篇文章為本，批判柏林對科學的認識有限；把眾多各種不同的「科學」，如數學、化學、物理學和社會學……等，劃上等號、混為一談，卻未能識出史學近兩百年間已經相當科學化，也產生了許多可靠和正確的歷史知識。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4), 212-213. 另外，拙作〈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也以單篇文章〈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歷史的必然性〉的分析研究為主。

13 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87~401。

更是史家必須一肩擔負的職責。柏林說：「……歷史家們，以及偵探、法官和陪審團，也都確實想要盡其可能，去確定人類應該負起那些責任。而這個決定『有責任』與『無責任』的關鍵，也正代表了『歷史』之可信與不可信……。」[14]但所有的判斷是否都具有主觀的色彩？如此又該如何看待？柏林繼續申論他的看法。

（二）歷史的主觀和客觀問題

柏林指責，當今普遍存在著某種對於「歷史客觀性」（historical objectivity）的質疑，亦即認定史家和常人一樣都受制於現實環境的制約，偏見無可避免，因此史家注定永遠無法超脫「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束縛。

柏林承認歷史敘述中，史家會針對具有特別重大的「影響力」、「權力」或「重要性」的某些人與事，[15]進行選擇和描述，史家在其中所做的判斷確實沒有固定一致的標準。柏林不否認從這個角度來看，「每一個判斷都是相對的，每一種評價都是主觀的，都是本身的時空因素之個別、及集體交互影響所造成的。」[16]但柏林提醒，這其中又的確存在某些「共同的假定」，做為我們和研究的對象或者過去之人溝通，以及相互瞭解的基礎；[17]缺乏這層共識，所有的理解勢將不可行。在柏林看來，這些共同的假定讓所謂「客觀」和「主觀」之間有了衡量的標準，雖然兩者之間的認定因時因地而變。柏林斬釘截鐵地說：「『主觀』與『客觀』之間，沒有固定不變的界線存在。這一事實，卻並不意味著說二者

1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1986），161；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1.

1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92；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3.

1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96；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6.

17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05；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52;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7), 18.

之間沒有界線存在。」[18]

柏林認為主客觀問題所以引發議論，究其實是人們把歷史和科學相類比，要求歷史達至「科學」的「客觀性」標準。在此，柏林面對了歷史和科學的問題。

（三）歷史與科學之間

柏林以史家的選擇和歷史敘述的特質為證，說明歷史固然不同於想像文學，但它必然無法避免那些在自然科學中，可以被正當地指摘為「主觀的」、從某種經驗性的意義上來說，甚至是「直覺的」因素。[19]柏林指出，科學之外，存在著歷史以及一些「不精確的」學科。這些學科是建立在「常識語言，以及文學、和人文學科裏體現的某種程度的具體性（concrete）、模糊性（vagueness）、曖昧性（ambiguity）、暗示性（suggestiveness）、以及生動性（vividness）」，[20]而「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即充分展現這些特質。

柏林進一步指出，一般科學家們多相信存在著某種次序（order）或關鍵要素（key），可藉以破解如幾何學或地理學的奧秘。然而人類歷史中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作用其中，譬如人的自由意志即會左右歷史的發展。人因而無法掌握全盤，只能看到部分。最終歷史學家面對過去時，無法也不可能完全重建過去。

柏林不但認為史家不能如科學家那般全然掌握所研究的對象（過去），也堅稱兩者所關注的面向大不相同。「史家的工作是去告訴我們世界上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因此他們會抗衡那些刻板的理論模式……科學的真正目的是去注意客體行為中相似性的多寡，並去建立最大程度的普遍性（generality）……因此一位史家想要呈現的是某種個性或一系列事情，或歷史情境中那些特定的（specific）、獨特的（unique）部分，

1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94；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5.
19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8；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0.
20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91；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2.

因而讀者獲知這種記述時，將可以掌握這個情境的所謂『具體面貌』（concreteness）……。」[21]

令柏林遺憾的是，許多學者看不清科學與史學特質之別，一廂情願地欲把科學的價值標尺套用在歷史上，甚至要在人類發展中追求「歷史模式」或定律。

（四）事實與解釋

柏林堅持必須分清楚事實和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事實」和「理論」與「詮釋」之間的區別。

其實，柏林強調「事實」意在駁斥「形而上的模式」，[22]並辨明「事實」和「虛構」的差距。此外，在柏林的劃分中，事實也和理論、詮釋不同，他所謂的事實乃是：

> 假如我說：史大林已死，而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還活著，則我的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卻絕對沒有一個腦筋清楚的人，會認為我是在提出一種理論或解釋。[23]

更明白地說，柏林認為：「……『事實』是可以被證據檢驗的，它相對於詮釋、理論和假設、觀察角度。事實不因為各種不同看法而不同……。」

但是，柏林也不認為單單事實就可構成「歷史」。在他看來，還需要「把那些事實置於具體的、經常也是模糊，但卻是延續、豐富的『真實生活』的整體脈絡中，……才能稱得上是歷史。」[24]

將事實放入某種整體的脈絡中，既是發揮史家長才所在，則這個工

---

21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21-22.

22 不過，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柏林又承認必須使用「模式」，且他在先前談論「觀念史」研究的方法時，即承認必須使用「模式」。柏林的用詞有時不甚明確。但基本上，他反對以形而上的、無經驗事實做為證據的模式。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11；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56.

2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98；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8.

24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26.

作是否需要某些特殊的能力？柏林在此談到他對史家能力的「期待」。

（五）史家的能力在直覺或邏輯技能

在柏林眼中，史家工作重在「描述」事實和現象，是要「告訴我們世界上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並透過某些特殊的、明確的記述，讓讀者掌握情境的「具體性」（concreteness），以獲得「真實感」（a sense of actuality）。[25]在〈刺蝟與狐狸〉一文中，他簡要地說：「歷史學家職司何事——描寫」。[26]而在〈歷史的必然性〉中，他也如此提到：「……歷史家的任務是要去發現與描述所發生的事情，並且說明它們如何發生、為何發生……。」[27]

柏林看重史家的描述工作，那麼意欲成就此一任務，除了謹慎的觀察、具備正確的知識外，還需要何種能力？柏林說道，考察任何這種內涵的過去，刻劃某個時代和人物的獨特觀點，這屬於「……一種了解（understanding）的形式」，[28]這種了解不能由科學的分析和推理方法獲得，也不能求諸自然科學中抽象和技巧性的活動，真正需要的是同情、興趣和想像力（imagination），以及生活的經驗：

> 那種能力稱為想像的洞見（imaginative insight），在它的最高天賦層次，史家和小說家、戲劇家以及一般的人擁有它而能了解生命……。[29]

但柏林坦言，此種洞見很難由後天的人為過程養成，而多半是出自個人的天賦、靈感（inspiration）。或正因此，柏林屢把史家和「傳記學者」並舉，也常把史家和「小說家」、「戲劇家」兩相類比。不妨說，在柏林眼中，歷史探究的最終目的是在「傳達」，他因而特別重視歷史的呈

---

25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28.

26 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44。

27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2；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6.

28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21.

29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25.

現方式與呈現技巧等層面。

整體而論，上述柏林的看法相當凸顯歷史與科學的差異、史家的主觀判斷、歷史敘述和傳達的功用、史家的文學素養與天賦能力。吾人當然能在柏林思想中挑揀到許多與今人的眼界扞格不合或相近之處。例如，柏林對於「事實」和「解釋」的區分很容易遭致簡單的「二分法」之譏，而他對於所謂「解釋」和「理論」、「模式」的分別，也未有更加深入的闡明。此外，柏林對於「自然科學」的觀點似仍侷限於二十世紀以前的陳說；他之視自然科學的知識為絕對客觀、去人性的唯理思考，與二十世紀以來科學內部歷經自我反省後所展現的形象，有著相當程度的落差。[30]再如柏林認為歷史鑽研的是過去中的獨特和差異現象，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共相，唯這樣的看法已因社會科學的影響而逐漸為更新的史學觀念所修正：歷史同樣可以處理特定社會中的共通現象。另一方面，在經過了後現代洗禮的今天，許多歷史學家已能夠坦然接受史學的確具有詩意的、文學的特質；史學作品猶如文學，需要佈局、組織情節、運用各種譬喻加以敘述。柏林在史學的科學與文學論戰中，強調史學的文學特質，似又能迎上新的思潮趨向。

以上這些批評都從後見之明的角度著眼來評斷柏林，這類評價甚至可無限延伸。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帶著特定的標準審度柏林，卻可能讓柏林離他的時代越來越遠，讓柏林的面容越來越模糊，而忽略了柏林所持的看法在當時文化時空下立足之點，以及在 1950 年代前後的英國學界中，柏林提出這些史觀的意義。

帕克（Christopher Parker）曾試圖闡釋柏林的史學意義。他以〈歷史的必然性〉一文為例，說明 1940 年代末期和 1950 年代之時，人們目睹當代文化中個人意志漸被剝奪，由此滋生某種恐慌與危機意識，柏林正是有感於個人主義在現今世紀中四面楚歌的境遇，試圖以〈歷史的必然性〉一文力挽狂瀾。帕克以「舊派自由傳統的代言人」來概括柏林在

30 例如Aviezer Tucker批評柏林對科學的認識。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213-214.

此文中的表現，[31]指出該篇文章中主要撻伐的是決定論，他的言論代表了自由主義向社會科學主義的抗議。[32]

帕克旨在將柏林歸入他為英國 1850 至 1950 年，百年間的史學發展所勾勒的模式，此即個人主義和全體主義的長期對立。確實，若依帕克的脈絡，柏林被定位為「個人主義」之一方，無可厚非。但應該留意的是，柏林在 1950 年代除了〈歷史的必然性〉之外，尚陸續完成其他幾篇談論歷史的文章，他在這些字裏行間不斷談說歷史，甚至以歷史學家自居。若從其中所涉及的豐富歷史內涵來看，「舊派自由傳統的代言人」一詞恐怕過於簡略，無法道盡柏林文字之間所欲傳達的旨趣。亦即柏林的目的恐怕不只如帕克所說，僅止於批判形上學或鞏固行將消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自由而已。他似欲同時「重塑」或「建構」一套歷史觀點。[33]

柏林的談論擴及歷史知識的特性、歷史學科的特質、史家工作的目的、史家所應具備的能力，看起來這已是一套內容相當完備的歷史觀點。讓人訝異的是，柏林閒散自由的文字風格當中，[34]竟然細密地構築一套內容頗為完整的歷史論說。他這般侃侃而談各種「歷史學」的問題，懷抱的想法是什麼？他對於這套史論中所涉及的種種議題何以如此關注？

---

31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0), 223.

32 除了帕克之外，也有許多學者從反決定論的角度解讀柏林的〈歷史的必然性〉，例如和柏林同時代的荷蘭史家Pieter Geyl。參見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89。

33 批判決定論的確是柏林在 1950 年代以及〈歷史的必然性〉中所表現的重要思想抱負。參見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87~400。不過，柏林的抱負應該不只是「破壞」，除了批判之外，柏林顯然也在試圖「建構」。

34 柏林的寫作通常帶有演講式的、自由揮灑的風格，很少見其如一般學術論文羅列引文和證據。參見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7. 此外，也有與柏林同事的牛津歷史家認為〈歷史的必然性〉一文「詞藻堆砌」太過嚴重。參見邁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343；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224.

若從柏林個人學術發展的歷程來思索，一個可能的推論是：他於1950年前後決心踏入觀念史研究的園地，這是棄哲學而步上歷史的重要一步，那麼他隨後釐清並建立自己的史學觀念，乃屬合情合理之舉。但這是單從個人的內在觀念演進所作的解釋，卻可能忽略個人抉擇背後存在的社會因素。

不妨察看一下牛津哲學家賈蒂納（Patrick Gardiner, 1922~；另譯加登納）在1950年出版《歷史解釋的性質》（*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一書中的導言。賈蒂納把歷史的問題區分為兩種：「歷史中的（within）問題」和「關於歷史的（about）問題」。身為哲學家的他，坦承自己有興趣探討的是後者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

> 關於（about）歷史……的問題有「歷史是一門科學嗎？」、「我們如何知道歷史事實？」、「有客觀的歷史描述這種東西嗎？」、「歷史的（如馬克思）理論和解釋的性質是什麼？」、「有歷史規律嗎？」[35]

賈蒂納並在書中廣泛討論歷史家描述與解釋的工作、史家的直覺能力和邏輯思考等問題。顯而易見，這些也正是柏林在文章中所闡釋的幾個重心。

此外，華雪於1951年撰寫《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時，書中主要的篇章也包括了「歷史和科學」、「歷史解釋」、「歷史上的真實和事實」、「歷史的客觀性」等課題。只需稍事對照，當可發現這些篇名頗能與賈蒂納「關於歷史的問題」內涵互相呼應。

由此看來，柏林對這些議題論述之殷，也許不只出於填補個人觀念上的遺缺，更可能是回應與參與當代文化中重要歷史議題的討論。[36]不

35 帕特里克・加登納（Patrick Gardiner）著，江怡譯，《歷史解釋的性質》（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導言〉，2；Patrick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

36 Stefan Collini不同意此點。他批評柏林「甚少扮演公共的知識份子的角色。大體而言，他在當時的政治和道德議題上都避免公開表明立場，除了少數的例子，如知識自由和他持

僅如此，柏林在 1950 年代甫入歷史領域，即已涉入當代「歷史」的論爭。這場論爭的主要對手是當時著名的史家巴特菲爾德和卡耳，爭論的焦點以「史家的道德判斷」為始，擴及史學和史家的根本問題。此一議論甚至延續至 1960 年代不休，並對柏林的「歷史」認同可能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

二、柏林與巴特菲爾德的相遇

構成柏林歷史觀點的起點是史家負有道德判斷的責任。同時，他也認為歷史和科學無法類比，兩者本質並不相同：歷史固然需要運用某些解釋，將事實置入整體脈絡中，使事實具有生命，但這與科學的追求通則，或某些決定論者追求形而上的模式完全是兩回事。此外，史家在進行描述和闡說過去的工作時，主要倚靠的不是分析和邏輯推論，而是深刻的洞見、靈感和想像力。這些見解可以說預設了柏林在 1950 年代史學圈中的立足點，以及在史學思想上孰為敵孰為友。

其實柏林並非憑空而論，他在〈歷史的必然性〉文中明明白白以卡耳和巴特菲爾德為爭辯對象，並且坦言自己無法苟同這兩位學者之見。柏林用了數頁篇幅，直指卡耳是受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影響的現實主義者，巴特菲爾德是基督教的護教者，兩人雖然治學取向和目的不同，但都主張史家不可逕行道德判斷。柏林分析他們的論據主要有二：一是認為個人的動機對於現實事件的發展影響極微，史家寫作時就

續支持的對錫安主義寬容的問題外。他也並未真正參與過文化批評者的工作，也就是去評價當代社會習俗中的態度與價值。」不過，為柏林寫傳的 Michael Ignatieff卻有不同的意見。Ignatieff在《他鄉：以撒・柏林傳》中述及：柏林從 1940 年代開始透過BBC廣播以及講演，向廣大的聽眾傳播嚴肅的知識問題，並「從此成為一位大眾的知識份子」。參見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207; 邁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312~314。筆者以為，從柏林在 1950 年代初期的數次演講中，對於歷史這門學科的意義與價值多所宣示這點來看，Collini此種看法或許過於絕對。

不應該把焦點重心放在個人的決定和意志上；二是認為個人並非全知全能，無法真正掌握事件的責任歸屬，因此史家面對過去時，只能謙沖為懷，不應獨斷地臧否是非。[37]

據柏林所見，巴特菲爾德基於人類的許多災難都是導因於某種「人類困境」——也就是事件的發生非人所能主導，乃是許多複雜因素交相構成，他因而提出「我們就應該學會設身處地去諒解他人，善待他人。身為歷史學家，如果我們很審慎小心只說些該說的話，那麼，我們至少應該學會擱置判斷，不加褒貶，因為證據總是不充足的，而歷史上那些被指為罪犯的人，也不過是些陷身漩渦之中，無法自拔的泳者罷了。」[38]基本上，柏林把巴特菲爾德的這番看法歸類為某種悲觀的態度。

若翻閱巴特菲爾德的著作，我們大致可以推定，柏林的評論應是針對他在 1951 年他所出版的《歷史和人類關係》（*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一書而來。然而，巴特菲爾德德早在 1931 年《輝格的歷史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即已面對這個議題，他也因此書而揚名英國學界。[39]巴特菲爾德於這本具有經典性質的小書內，嚴厲抨擊某些史家（他一概稱為輝格史家）以現在心態（present-minded）來審視過去的不當。對於英國歷史傳統中致力拉近歷史與現實關係的文人學者而言，巴特菲爾德的批評是一次迎面痛擊。尤其在「歷史和價值判斷」（“History and Judgment of Value”）這章內，巴特菲爾德指出，輝格史家的錯誤之一是急切地要對歷史進行價值判斷，讓歷史屈從於特定問題之下，並且以為史家握有最後的裁決權。[40]巴特菲爾德堅拒這種看法。他認為史家只是觀察者，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去捕捉和描述具體的、特殊的、偶然的發生，而非用哲學原理去解釋事件；史家更無能力判決

37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2；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6.

3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79；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3.

39 關於巴特菲爾德的生平及主要論述，請參考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68~82。

40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64-65.

人類的所行所為究竟是對或錯。[41]

整體而論，《輝格的歷史解釋》的書寫明顯偏向「聲明」而非「說明」，作者對自己的思考立論著墨甚少。我們因而不難揣測，隔了二十年之久，巴特菲爾德為何要在《歷史和人類關係》中重闢戰場，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當然這一方面也顯示，在他心中，此一議題即使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然位居英國史學的核心。

1951 年，巴特菲爾德重新思索這個議題時，並不否認「個人想法」（personal opinion）多少會滲入敘述之中，但他仍然堅定聲明「道德判斷」的危險：

> 然而，一個更大的危險會隨之產生，假如道德判斷被併入敘述的結構之中，假如它們控制整個故事的跌宕起伏，假如它們深植而成我們歷史思考的主要成分。尤其必須要抗拒的是宣稱歷史學家的莊嚴任務就是道德仲裁的那些人，……。[42]

巴特菲爾德的確如柏林所言，從基督教之人皆有原罪、人皆不完美的要義，推論出同樣身而為人的史家，必也無能參透最深邃的奧秘，無法真正掌握事實的全貌或根本之因。在這本書裏，巴特菲爾德說道，史家頂多只能行使低層次的道德判斷，至於那最高的神秘，不是凡人所能企及和攀附的。[43]

巴特菲爾德相信將道德判斷置入歷史敘述架構中極其危險。而這卻激發柏林藉〈歷史的必然性〉嚴正提出另一種主張，以為抗衡：

> 我們在審度人類如何行動與生活，又如何而有這些行動與生活的時候，人類的動機與責任，是勢必出現的問題之一。要描述人類行為，對於個人性格、目的、動機卻略而不談，永遠只是矯飾失真，而且是過於嚴苛的作法。[44]

---

41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68-75.

42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105.

43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108, 116.

4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7；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97.

看來兩位學者對於「史家的道德判斷之責」各持己見。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巴特菲爾德在 1930 年代所表達的某些歷史概念，其實與柏林的想法頗為接近。例如，他認為歷史處理的是具體、特殊和偶然的事例，歷史家無法完全掌握歷史的情境；史家重在描繪、呈現，而非附會形上的哲學理論。這些論點實與柏林所見雷同。兩人的基本史觀既然相去不遠，又何以在道德判斷的議題上起了干戈？若從時間上來看，巴特菲爾德對歷史與道德判斷問題的興趣，早在 1930 年代之初，當柏林還在就學時即已顯現。那麼柏林和巴特菲爾德是站在同樣的平台上發言嗎？柏林對巴特菲爾德的回應與批評，是否充分理解了巴特菲爾德的論述脈絡？至於道德判斷議題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延燒至冷肅的二十世紀中葉，柏林加入此一探討的行列，代表的是舊問題的再思考，或者是借著舊問題而發揮新的意見？

欲探究上述問題，可以入手的一個關鍵在於巴特菲爾德的思考所出，亦即他關注史家價值判斷這個問題的緣由，以及柏林對這個問題的詮釋內涵和巴特菲爾德的著眼之處是否一致。如此實有必要回溯英國史學發展的若干軌跡，尋找道德判斷議題的根源，或能較為深入柏林與巴特菲爾德兩人「爭論」的始末。

三、英國史學中兩種理念之爭

肯樣（John Kenyon, 1927~）認為巴特菲爾德的《輝格的歷史解釋》批判的是二十世紀以來在英國文壇中享譽盛名的史家崔衛連（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而且是延續了崔衛連與另一位史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在二十世紀初期歷史辯論的話題。[45]從更廣泛的眼光來看，巴特菲爾德的書確實成形於英國史學特有的發展上。

45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93), 241.

回溯十九世紀之時，英國史學特別強調歷史的教育—文學功能。當時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和麥考來（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等這些名家的作品皆以傳達某些義理、服務社會為目標。卡萊爾說過:「書寫是一種國家教育的工作」,[46]「歷史乃是教誨(instruction)的信牘」。[47]他期待歷史發揮教化功用，甚至自詡為文人先知，志為社會大眾揭示歷史中巨浪狂濤的真義。至於麥考來更一心冀求寫出足以媲美流行小說的暢銷作品。他曾言：「事實不過是歷史的渣滓」，史家為了歷史的社會目的，盡力運用文學的技巧和表達的效果乃無害之舉。[48]麥考來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版的五冊《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確如其所願，在英國創造了高銷售率，迄今仍為後人津津樂道。[49]十九世紀下半葉還有如格林（J. R. Green, 1837~1883）撰寫的《英國民族簡史》（*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這本非學院的大眾讀物，同樣講究文采，廣為流傳，甚至被列為牛津現代史學院（Oxford School of Modern History）的推薦書籍。

此一追求教育—文學功能的歷史取向即使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逐步設立獨立的歷史研究專科之後，仍然強韌維續著。當時歷史教育多被當成仕紳養成的重要基礎，許多修讀歷史課程的學生抱著實用的目的而來。他們的父母若非士紳階層就是專業人士，或是具有文化教養的商人階級。在他們眼中，讓家中子弟到牛津或劍橋走一遭，

46 林慈淑，《一個文人英雄的誕生——卡萊爾的思想與時代（1830-1840）》（臺北：稻香出版社，1998），148。

47 林慈淑，《一個文人英雄的誕生——卡萊爾的思想與時代（1830-1840）》，164。

48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45.

49 麥考來的《英國史》在英美出版界都締造了銷售佳績。在美國，只有聖經和一些教科用書能與之匹敵；而在英國，此套書成為維多利亞中期最為暢銷的讀物。1875 年時，其第一冊已經賣出近 14 萬本。曾有圖書館共買進 2000 套以上的《英國史》，且因借閱率過高，該圖書館還得另闢專室處理。也有曼徹斯特的一位仕紳每晚邀請鄰近的窮人來聽讀麥考來的這套書。由此可見，此書所吸引的大眾不只是有閒階級而已。參見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4.

日後會比較容易謀取某些特定的職業或職位，如此將有助於延續家族的地位。[50]因此，歷史在現實中是鞏固士紳階層的一大助力。歷史與政治、社會的深切關係足可想見。

然而眾所周知，十九世紀日耳曼地區開始了歷史的職業化和科學化浪潮。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在 1824 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呼籲，歷史不應該是以收集道德範例、垂訓於後世為目的。他說：「歷史一向被賦予評價過去、教化現在以有用於未來之責……本書並不奢求這麼大的目的，它只想呈現事情的真正經過。」[51]蘭克在 1830 年代於柏林大學設立「研究班」（seminar）課程，宣示了歷史的專業訓練之必要性。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歐美各國大學也多半踵繼其腳步，紛紛設立研究班和強調研究為主的學院，以取代或補充原先的講座。[52]歷史職業化自此成為各國史學發展的主流，這股趨勢尤其訴諸科學化的超然公正、不偏不倚態度和嚴謹的考證，易建立歷史學的客觀性。

顯而易見，來自日耳曼的史學新主張與英國既有的歷史走向難以相容。科學的、客觀的以及教育的、文學的歷史，這兩股「勢力」終不可避免碰撞衝突，伯里與崔衛連的爭論即是這兩股勢力對峙的著名例證。

1902 年，伯里於劍橋大學國王講座教授就職演講時，發表了〈歷史科學〉（“The Science of History”）一文。這篇文章向以「她（歷史）就是一種科學，不多也不少」這句話名聞遐邇，伯里的確也在文中宣揚歷史應該追求某些科學的特質。

伯里首先揭櫫歷史正處於一個「轉換」（transformation）、「變化」（change）、「革命」的關鍵時刻，[53]此當然意指日耳曼科學化運動帶來

50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274.

51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4), 73-74.

52 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臺北：昭明出版社，2003），41；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1997), 27.

53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了新方法和新知識標準。伯里所謂歷史的科學化鎖定在兩個問題上：其一，他認為大學中應該加強和推進研究，這是大學最高的職責所在。他呼籲社會各界人士與捐助者應該重視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能短視近利，只看重立即的效用。其次，伯里提出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必須祛除主觀的偏私，不以當前的利益危害客觀的判斷。伯里在此自然是針對他口中所謂「政治——道德理論」的舊觀念而發，他甚至不具名批判一些牛津教授妥協於政治和道德的力量，[54]背離歷史的求真。[55]

伯里深信歷史就是一門科學，它必能達到某些科學所珍視的價值，例如「客觀」的收集和評鑑材料，以及歷史研究者不涉世事、維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等。但他的論點隨即在隔年，即 1903 年 11 月遭到《獨立評論》（*Independent Review*）上一篇文章的批判。該文作者正為麥考來的姪子、也是歷史學家的崔衛連。[56]

崔衛連在此文中首先感慨道，歷史這門學問最近的確歷經變化：歷史不再是為一般閱讀者而寫的「文學」，而是為專家而存在的「科學」。他更把這種舊的與新的趨勢標舉為「現代的德國」（modern German）理念和「古老的英國」（old English）理念之間的一場競爭。[57]

在崔衛連眼中，把歷史比擬為「物理科學」實為謬誤之至。他分析物理科學有兩個特色：一為追求直接的實利，二為尋求因果法則。在他看來，兩者都不是歷史能夠臻至的功能；[58]歷史只能藉由想像力而得出最可能的歸納，歷史不變的本質是「一則故事」：

---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210-211, 215.

54 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140。

55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17-218.

56 伯里死後，崔衛連重印這篇文章時，刪除了直接提及伯里的部分。

57 M. G.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28-229.

58 M. G.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30.

> 由於今日歷史學者都出身於德國化的訓練體系，不把歷史看成是一種福音（evangel）或一則故事，而是視之為一門科學，他們因而如此忽略歷史家最主要、最根本的技藝：敘述的藝術。[59]

崔衛連提醒史家莫忘自己特有的拿手本領：敘述，他更在文中稱頌十九世紀的卡萊爾以及他的叔伯麥考來的作品，讚譽他們是「文學歷史家」（literary historians）。但崔衛連念茲在茲的並不是歷史究為科學和藝術，而是他提出的第三個歷史意義：「簡言之，歷史的價值不是它的科學性。它真正的價值是在教育上。它可以教育人心反思過去而達成教育的目的。」[60]就某個角度來說，崔衛連的提議並無新意，他毋寧在重述過去以來的歷史—教育的傳統，藉此抗衡「德風」之侵襲。

已有許多學者談及崔衛連在這篇文章中誤解了伯里所謂「一種科學」的含意，[61]不過，崔衛連恐怕最為憂慮的是專家的（specialist）、科學的歷史漸有取代文學的、教育的歷史這個現象。他自言護衛的是英國古老的傳統，此一傳統在崔衛連看來卻受到日耳曼學術風潮的侵蝕，使得歷史日漸遠離社會大眾。他憂心忡忡：「我們國家在精深的學院精神有所獲得，與此必然相對的是，廣大的文學精神有所喪失了。」[62]崔衛連在文中並且三番兩次把這種科學歷史的新潮流和「學院」（academic）歷史並舉，以有別於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謂「文學」歷史家。「學院」歷史家與「文學」歷史家的分類自此常為後世沿用。

---

59 M. G.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34.

60 M. G.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33.

61 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153；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183, 238. 周樑楷認為，崔衛連把伯里所謂的「科學」曲解為較狹隘的「自然科學」。John Kenyon則指出：伯里提倡歷史的科學化主要針對的是判斷證據和處理資料的方法，他並不排斥以文學的技巧去表述研究所得，他甚至稱讚十九世紀的麥考來，因此崔衛連是誤解了伯里之意。

62 M. G.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28.

以上伯里與崔衛連各為學院的歷史與文學、教育的歷史而辯，看起來兩種歷史理念之間似乎甚難相容。尤其史家個人的道德立場更是分立的關鍵。對伯里來說，史家萬不可挾道德立場損害歷史的科學性。相對的，崔衛連期待歷史發揮教育力量，他堅決相信歷史的文學和藝術技藝最終應該宣揚的是英國的經驗智慧、英國的寬容精神以及英國的自由體制。[63]自然而然，崔衛連看待史家的道德判斷乃是貫徹歷史普及功能不可或缺的要素。

無論如何，伯里與崔衛連的交鋒並非這兩種歷史理念之爭的最後一役。隨著科學化史學精神日益得到張揚，二十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力主排除史家的預設立場，以提高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及學術地位。這樣的呼聲也在英國的史學圈中時有所聞。例如鑽研英國近代憲政歷史、挑戰「輝格」歷史解釋而聲名卓著的納米爾（L. B. Namier, 1888~1960），即以排拒先入為主的政治哲學為治史目標，強調縝密細緻地爬梳材料，追求歷史真相。他曾說：「除非先把自己浸透在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才能穩當地說：我的確可以運用他們的語言，也瞭解這個時代的語言。」[64]換言之，納米爾期許史家拋開自己現實的立場，深入所研究的時代，以獲得最真切的理解。而巴特菲爾德在 1930 年代初期援「輝格史家」之名，抨擊崔衛連所代表的文學—教育歷史這一系絡，與納米爾實屬同一脈歷史概念而來。

但儘管巴特菲爾德的攻擊火力猛烈強勁，這一古老的傳統並未在科學主義的橫掃之下灰飛煙滅，「文學和實用的傳統」依舊在學院之外的文化圈中蓬勃發展，例如崔衛連所寫的書縱橫英國文壇，直至 1930 年代。他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from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更是風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65]此

63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59.

64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91.

65 雖然崔衛連的《英國社會史》受到愛國主義的驅使，以一種懷舊的心態描述過去的英國為快樂無憂的時期，且以一種簡單的分法認定社會史就是「排除政治之後所餘下的歷

外，與柏林交好的自由派史家費雪（H. A. L. Fisher, 1865~ 1940）還在1928 年一次名為「輝格史家」的演講中，讚賞麥考來和崔衛連都不是學院派的老師，而是講求實務性和有閒之人（men of affairs and of leisure），因而能深體政治生活中的實質面。[66]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崔衛連的學生威基伍德（C. V. Wedgwood, 1910~1997）。威基伍德自 1931 年從牛津畢業之後，即請辭任何學院中的職位，專事撰寫能夠激發英國年輕學子熱情的歷史著作。威基伍德長於描述，強調筆端要帶著感情，她所寫關於三十年戰爭和英國內戰的歷史風行書市，深受大眾喜愛。威基伍德堪稱是崔衛連歷史信念的承繼者，雖則崔衛連曾對友人說：她是二流的歷史學家。[67]

威基伍德的歷史理念具現在她 1959 年出版的文集《過去意識》（*The Sense of The Past*）中。威基伍德認為，蘭克所標榜的價值中立只能是一個「高貴的理想」，因為這在實際上根本無法履行，除非歷史要全面棄絕道德判斷的所有功能。[68]威基伍德相信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必然也是一名藝術家；如果沒有藝術，那頂多只有一些語句的累積、一些年代的堆砌，但不會有歷史。「無論用任何方式去思考或看待歷史事實，而且如要有任何價值的話，那就必定要運用想像力和識別力。只要是可以為人理解的歷史，就都是藝術。」[69]

若拿威基伍德和柏林的史觀相較，吾人實不難讀出兩人思考的相似處，無怪乎日後卡耳在「什麼是歷史」的系列演說中，屢屢將柏林和威

史」，這些看法常為人詬病。但此套書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成為暢銷書，至 1949 年時已賣出 40 萬套。見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245-246.

66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127.

67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243.

68 C. V. Wedgwood, *The Sense of the Past: Thirteen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7), 51-52.

69 C. V. Wedgwood, *The Sense of the Past: Thirteen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92.

基伍德相提並論。也就是說，在 1950 年代柏林所發表的史論，毋寧神似於「文學史家」這一傳承。

看來，學院外的「文學歷史」並未如崔衛連所曾憂慮那般，已經江河日下，甚至在動盪的 1930、1940 年代間，這些強調普及化和大眾化的歷史書籍反能異軍突起，締造出版佳績。證諸威基伍德在 1956 年發表的〈屬於文學的歷史〉（“History as Literature”）一文，回顧二十世紀之初，歷史與文學的密切關係一度受到「學院觀點」的損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隨後的半世紀文學化歷史勃然復興，尤其在貧乏的戰間期內，公眾對可讀性高的歷史需求甚殷，許多史家也積極投入大眾歷史的書寫。[70]

威基伍德所提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文學歷史的盛行現象，細究其因，應與兩次世界大戰間，英國學院內的研究者和史家多半從事中世紀或近古的國會史和憲政史研究，而且強調資料的引證和堆積，卻對現實疏於關懷，也絕口不談當時如納粹主義高漲的現實問題不無關係。[71]這些所謂學院內的、專業的史家自絕於社會之外，或因此導致文學性、走大眾化路線的史學作品大行其道。同時，與現實隔絕的現象倒不限於歷史學內，1930 年代科靈烏也曾批評哲學圈受到實在論（realism）的影響，放棄道德哲學的立場。科靈烏說：實在論者錯誤的宣稱「沒有一樣事務會因為人的認知而受影響，人的行為亦然。道德哲學只是道德行為理論，所以它不可能影響道德行為的實踐」，[72]以致這些「超然於外的專業思想家」（detached professional thinker）、「瑣碎的哲學家」（the minute philosophers）都把哲學抽離實際的政治生活，並打出「知識遊戲無關道德（amoral）」的口號，而使哲學的思考和實際的人生無關無涉。[73]

---

70 C. V. Wedgwood, “History as Literatur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6 January, 1956, xi.

71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288-289.

72 柯靈烏（R. G. Collingwood）著，陳明福譯，《柯靈烏自傳》（臺北：故鄉出版社，1985），59。

73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120-121.

無論如何，當學院歷史遠離社會大眾的品味和需求，文學化歷史反倒更能打動人心，以及滿足一般讀者精神的需要。顯然，在英國史學的發展上，科學的、專業的歷史與文學的、教育的歷史兩股勢力始終爭鬥不休，其拉鋸時間之漫長更遠超乎我們的想像，雙方勢力的消長和高下也並非立時可見。文學化的歷史儘管面對十九世紀以來科學化歷史的攻略，不曾節節敗退，反倒順勢發展、興盛一時。不難想像，以教育性和文學性為訴求的歷史著述，難免浸潤著史家個人的價值觀，這也意味著歷史與道德判斷的關係依然是許多追求科學精神的史家特別關注所在，而持續在史家之間激盪出不同的意見。巴特菲爾德於 1950 年代初重啟此一議題，絕非毫無緣由。

四、柏林與巴特菲爾德論「道德判斷」

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巴特菲爾德，於 1951 年的《歷史和人類關係》這本書內再度拋出了「歷史中的道德判斷」問題，那麼經過二十年後，他是否在舊框架中展現出些許新意？

《歷史和人類關係》無論哪個章節內都可看到作者不斷論辯價值判斷的爭議。當然，如前所述，巴特菲爾德所以反對道德批判，基本上是建築在他對於「人之有限」這個宗教的信念上。然而他在舊的論題中，的確引入了新的論述角度。翻閱第一章，巴特菲爾德首先論及英國史學自十七世紀以來就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並逐步採用一種新的觀照點去看待人類歷史。他說道，正由於「史學的進步」（the progress of historiography），我們得以脫離「好人戰勝壞人的」的初等想法，採用新的論述結構和思考方式：

> 查理一世個人好或壞也許仍然有其作用，但不再成為核心問題，不再成為推動整個故事的基礎。我們會看到的是這個時期無論哪個英國君主都陷入某個嚴重的困境中……核心的問題是……一個

> 確切的困境，確切的情境，其中包含了衝突的因素，這與此時任何黨派的個別邪惡無關……。[74]

巴特菲爾德所認為的新觀點即是不以個別的好壞論斷歷史，而能環顧情勢和環境中的矛盾因素。他將此種思考角度定位為「更高層次以及更成熟」階段的史學，並稱之為「學院的歷史」（academic history）。[75]而具備這類新歷史解釋的眼光者，以及那些不以先入為主的信念妨害歷史研究、考察歷史時做到摒除個人私見和既定觀念的人，巴特菲爾德總稱他們為「專門史家」：

> 專門史家（technical historians），也許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但都願意及時丟棄自己的私見和個人的評價。他會進行一種「自我淨空」（self-empty）的動作，以便求得真理，這種真理不能逾越所掌握證據的界線，是證據迫使我們相信這種真理，不論我們喜歡與否。[76]

以上巴特菲爾德在延續過去反道德判斷的立場下之餘，以人類所處情境中存在著各種衝突因素，非個人所能撼動和突破為由，表明個人的特質和抉擇不足以成為史家考量歷史的重心，史家必須慧眼識出的是個人背後的「歷史」困境。他並且沿用了近半世紀前崔衛連所標舉的「學院的歷史」之名，把他所肯定的這種歷史新觀點歸於「學院的歷史」範疇下。至此，「學院的歷史」不再如崔衛連所界定的義同於「科學的歷史」，而是成為所有歷史著作的圭臬和價值判準。另外，巴特菲爾德在此書最後一章專論「歷史做為文學的一支」時，特別說明因為目標的不同而有兩類歷史之分：「文學的歷史」，專以「復原」過去和描述過去為旨；「科學的歷史」，重在分析和解剖過去。[77]他肯定這兩種歷史各擅所長，因而應該相輔相成。例如在十九世紀時，「文學史家所寫的論

74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14-15.

75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16.

76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101.

77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230-231.

辯的、批判性的以及某些具有開創性的作品，對於歷史心智的發展有所助益。」[78]

巴特菲爾德試圖超越過去的對立，其意至為明顯。他似欲平緩前此之爭，調和向來被認為難以並存的兩類歷史，修補長期以來這兩類歷史之間的敵對關係。[79]但必須留意，他並非泛指所有的文學歷史都值得嚴肅看待，都具備嚴謹的學術價值；他願意承認的是那些具有「論辯的」、「批判性的」以及「具有開創性」特色的作品。巴特菲爾德目睹許多文學的歷史強調「復原」過去的目標，因而運用生花妙筆以為輔助，但如此一來，卻也迫使文學史家經常得面臨一個極大的挑戰：如何吻合現代學術準則的要求，[80]也就是如何在靈活神現的敘述中，祛除個人偏見或黨派立場；如何超越一已之判斷和片面的意向，把握故事的整體性和複雜性。巴特菲爾德言下之意，文學的歷史未必都能夠達到「學院的歷史」這個高層次的水平。

無論如何，巴特菲爾德畢竟正視了文學歷史的存在，他雖套用「文學的歷史」、「科學的歷史」、「學院的歷史」等舊名稱，卻也重組這些名詞的內涵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與崔衛連的觀點不同的是，他以為「文學的歷史」與「科學的歷史」不必然對立或不能並存，但它們都應該臣服於「學院的歷史」這個更高的標準下。亦即無論哪類史家面對過去時，都必須自我淨空，不逞個人好惡隨意評斷，使自己臻至「專門史家」之層次。

同時，巴特菲爾德論及道德批判問題時的策略也迥異於伯里。巴特菲爾德從進步論的立場思考史學問題，[81]他彷若站在高點俯瞰史學的脈

78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242.

79 根據Kenyon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巴特菲爾德的影響甚大。他在《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1949）中用一種精神導師的語調發言：制度和系統會崩潰垮掉，但人會存活下來。他也強調教育及傳達歷史的重要性，因此對於納米爾那種強調制度性、結構性力量的歷史觀點不以為然。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276-288.

80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237-238.

81 史學自十九世紀以來即不斷朝向進步的觀點，在 1950 年代的英國史學界中是極為普遍

動，堅信史學必然歷經較低至較高層次的進展。在他的評量下，以個人的賢愚善惡解釋歷史發展的方式只屬於較原始初級的階段。至於史學發展至較高階段時，史家將不再執著於個人的善惡因素，反倒能洞悉歷史中存在的困境和各種複雜糾結的因素，進行深度的剖析。[82]

儘管不願意全盤否定「文學史家」的價值，巴特菲爾德的確從基督教觀念中尋求證據，援史學進步為依據，闡釋道德判斷之不當。那麼歷史思想偏向文學史家的柏林又是如何回應此一論題？

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柏林循著三方面討論「道德批判」：（一）對「人類困境」說的疑慮和駁斥；（二）從個人的自由抉擇談史家的道德判斷；（三）從語言分析的角度論道德判斷之無可避免。這三個論點的內涵分述如下：

（一）對「人類困境」說的疑慮和駁斥：柏林並未正面反駁巴特菲爾德關於人「所知有限」的困境，他本即主張吾人不可能全盤掌握過去的一切。由是，柏林承認「從某一個重要的意義上來說，那些冷酷的現實主義者以及基督教的悲觀主義者，看法是正確的。」[83]歷史作品中的確到處充斥著不實的指摘、過激的評斷。但讓柏林戒慎恐懼的是這種言論推展至極的後果：「個人責任都被有意地排除了」，而這無疑即是某種護衛「瞭解一切就是寬諒一切」的立場。[84]他更憂心，在假定人類不可能客觀的評論他人或過去這個前提下，所有的評論包括指摘某些史家濫用道德主義或耽於偏見，都將失卻合理性和正當性。在柏林看來，「人

的看法，參見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80~386。

82 巴特菲爾德一方面強調「人的有限性」，史家無法也不能對他人的所做所為逕下評斷。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史家應「洞悉」個人所處的情勢困境，「分析」其中各種複雜的力量。但所謂「洞悉」、「分析」與所謂「評斷」之間差距多遠、人的「有限」究竟止於何處，這似乎是巴特菲爾德思想中有待闡明之處。Richard T. Vann, “Historians and Moral Evalu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43, Theme Issue (2004, Middletown Conn.), 7.

8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0；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4.

8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0；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4.

類困境」說最終不但危及「歷史客觀性」的存在，甚至連道德中立這樣的說法也將無法成立，一切淪為虛空。[85]

（二）從個人的自由抉擇談史家的道德判斷：柏林支持史家不應迴避道德判斷，主要是源自他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個人的自由抉擇的信念。他相信個人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力量，「選擇、責任、自由等觀念，都深植在我們的人生觀中」，[86]那麼歷史解釋就有必要對個人所行所為提出交代和評述。例如，柏林認為歷史學家在描述重要的革命時，應當追究某些人物對革命的產生以及所造成不幸的該當之責，如此可謂正視了人類的責任、人類在有限度範圍內擁有的真正的自由。

（三）從語言分析的角度論道德判斷之無可避免：除了由「人類有自由選擇的能力」這個前提論說道德判斷外，柏林也從其他方面鞏固他的觀點。柏林指出，歷史學家不可能完全擺脫日常使用語言中那些「有可能傳達我們價值判斷、以及我們那些幾乎察覺不到的道德態度或心理態度的用語。」[87]也就是說，史家的工作存在著表達上的難處，即便「歷史家不必去做道德說教，也沒有義務去做道德說教；然而，他們使用正常的語言，因此不能不連帶用到其中的聯想，與其中本有的道德範疇。」柏林斷定「避免做道德說教，只是要採取另一種道德觀點，而不是完全拋棄道德觀點。」[88]

綜上所見，正如巴特菲爾德以史學進步觀為批判道德判斷的立場注入新意，柏林也在他的論述中為道德判斷的論題開創新局。過去文學史家多從歷史的教育功能著眼，強調賦予歷史教化意義的重要性。但柏林除了一貫點出歷史解釋中個人角色不應受到忽略之外，他甚至由語言分析切入，直指日常用語中無可避免的道德立場。范恩（Richard T. Vann）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歷史論述的一個主流是：從哲學角度去反省

8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4；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7.
8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18；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62.
87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87；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40.
8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21；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63-164.

歷史學中日常語言的問題，許多牛津哲學家深諳此法。范恩認為，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內展現的正是這種研究的角度。[89]

柏林和巴特菲爾德各自在道德判斷的問題上超越舊觀，他們的思考顯然也各有所重。巴特菲爾德從自身宗教信念歸結出他對道德判斷的消極態度，柏林則在個人自由抉擇的原則下建構史家道德批判的合理性。巴特菲爾德從史學進步論，賦予「學院的歷史」意義，期許史家達到淨空自己的境界。柏林則是在常識語言中凸顯歷史敘述難以排除道德意涵的特性。依此來看，兩位學者闡述「道德判斷」的文理並不相同，而他們口中的「道德判斷」意涵更不相符。巴特菲爾德主要針對英國史學傳統中無論以政治為名，或以教育為目的，有意無意地將特定價值觀直接灌入歷史研究中的習性。他批判的是某種「道德化」的史觀。而柏林關懷的是歷史解釋中的個人評價，以及歷史語言中價值內含等問題。兩位史家的論述明顯出自不同的思考點，兩人側重的也並非同一件事情。

由柏林與巴特菲爾德的論證中，可以看到「道德判斷」議題分化出兩種意義：一方面指涉道德化（moralized）的史觀，一方面涉及「價值」（value）評斷的實存問題，兩者並不相同。但是傾向於科學、學院觀點的巴特菲爾德，以及與文學、教育史家氣味較為相投的柏林，彼此似乎未能識出其中的差距。嚴格來看，柏林與巴特菲爾德形式上雖同樣參與了「道德判斷」議題的討論，他們之間並未有真正的「對話」；柏林對於巴特菲爾德的批評，恐怕不是奠定在充分了解對方思想來龍去脈的基礎上。他們頂多是在「道德判斷」的大傘下，各尋其位，暢其所言。所謂「瞭解」、「對話」之難，大概不僅存在今人和前人之間、史家和過去之間，甚至同為當代人，如柏林和巴特菲爾德，亦未能免。

二十世紀中葉，由科學的、文學的歷史觀點所引燃的「道德判斷」爭議並未就此打住。事實上，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局的影響，在那些

89 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in Frank Ankersmit &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Peaktion Books Ltd, 1995), 44-45.

年代中，史家的道德困境是備受關切的話題。而 1950 年代更是「道德判斷」爭論的高峰期。[90]繼柏林和巴特菲爾德之後，更大規模的論辯出現在柏林與另一位史家卡耳之間。有趣的是，某種思想「對話」的困境，又再次籠罩在這兩位學者的對壘上。

五、柏林與卡耳之間

柏林的〈歷史的必然性〉出版於 1954 年，隨後不久，卡耳即撰文回應。1954 年 11 月 17 日，《泰晤士報文學特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登載了卡耳所寫的〈歷史與道德〉（"History and Morality"）一文，向柏林表達反對之意，這也是兩人針對「道德批判」問題的初次辯論。

其實，在此之前，柏林與卡耳早已相熟。他們兩人的友誼發展，夾雜著後來彼此為維護自身理念不惜數度公開論戰、劍拔弩張的緊張對立，稱得上是一段微妙又曲折的歷程，也讓人從中見識到學者之間複雜而矛盾的關係。

柏林和卡耳的往來開始於 1938 年。由於卡耳在前一年出版了一本關於巴枯寧（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的傳記，柏林撰文評論。雖然卡耳直到四十年後仍然自認這是他寫過最好的一本書，柏林卻批評說：卡耳的著作資料齊全，注意細節，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傳記，可惜卡耳只注意巴枯寧的人格，忽略了巴枯寧在政治思想中的影響力。[91]卡耳為此寫信給柏林，因而開啟了兩人間長期的書信往來。

---

90 范恩指出，從 1959 至 1994 年之間，史家的道德評價問題在歷史界中幾乎是「消失」了，或被遺忘了。據他考察，這大約四十年內只有九篇文章和一本書論及這個話題。Richard T. Vann, "Historians and Moral Evaluations," 3-4.

91 Jonatha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1982* (New York: Verso, 2000), 64-65. Haslam指出，柏林對於巴枯寧的評價在數年之後有所轉變，越來越傾向於原先卡耳的觀點。

從卡耳當時的信來看，兩人尚未謀面。卡耳信中客氣提及，一度有機會經人介紹與柏林相識，遺憾的是當時錯過了結緣良機。不過，卡耳接著坦白表示：「你的論證並未說服我。」顯然卡耳有其堅持，並未完全信服柏林的評論。由此亦知，他們在學術信念上自始就不易謀和。有趣的是，這封信在柏林的眼中似有不同的解讀。試看 1938 年 1 月 13 日柏林寫給父母信中的一段話：「……那位寫巴枯寧的卡耳先生寫了一封非常諂媚（flattering）的信給我，我回信後會將之傳給你們。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個握有生殺大權的評論家，可憐的作者必須匍匐在我面前。我看我自己很快也會變成可憐的作者……。」[92]不可否認，柏林當時已是牛津新學院（New College）一名具有影響力的青年學人，卡耳的謙遜自然可以理解。而這樣的態度與關係，更不時顯現在卡耳與柏林後來的交往中。

1938 年之後，他們兩人仍然保持聯繫，或以書信，或相約聚餐，即使是大戰期間，柏林被派駐美國擔任情報工作時，柏林和卡耳仍藉著書信互通訊息，兩人的情誼因而隨著時間遞增。如 1946 年 11 月，卡耳在一封信中邀約柏林聚餐：「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面了，哪天如果你進城裏，希望能到牛津劍橋俱樂部找我吃飯。」總之，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中期，兩人密切來往，結為好友。尤其自 1953 年起，卡耳受聘擔任牛津巴利奧學院（Balliol College）的教師職三年，因此地利之便，卡耳更常常以便條紙或小卡片邀請柏林會面吃飯，兩人交情愈見深厚。[93]

卡耳和柏林從陌生到熟識，還可由另一個微細的地方看出。1930 年代兩人開始通信，那時彼此極為生疏，卡耳在信中都一律稱「柏林先生」，信後署名為 E. H. Carr。至 1942 年時，卡耳寫給柏林的信中已改稱柏林

92 Henry Hardy, ed., *Isaiah Berlin: Letters 1928-19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5.

93 柏林的書信和手札主要存放於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內的「現代文件處」（Modern Papers）。自 2001 年開始，Bodleian Library得到「柏林文件信託公司」（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的委託，逐步進行柏林書信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為「親愛的以撒」，信末署名仍是 E. H. Carr。而在 1947 年的信函中，卡耳的署名已改為小名 Ted。此一變化透露出他們的關係日密。

綜觀卡耳和柏林的交往，初始時卡耳明顯表現得較為主動，對於柏林的恭維也不吝於表白。例如，1947 年 10 月 27 日，卡耳寫給柏林的信第一句話即是「後悔自己生的太早，因此未能成為你的學生」，他並誇獎「你對共產宣言的評論著實發人深省」。至於觸及不同意的意見時，卡耳則小心提出「對此我幾乎完全同意你，除了我認為你忽略了宣言最後一段……。」雖然卡耳也常表露不能認同柏林的看法，畢竟當時柏林社會聲望已高，而卡耳尚在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們的交情日深的同時，兩人以文章互批對方觀點的情況已屢有所見。例如，柏林在 1951 年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卡耳在前一年 6 月：「對我的猛烈攻擊……他把我的那些文章解釋為對他主張的事物的攻擊。所有這些特別表現在他最近論俄國革命的著作中，在這本書中，反對派與受害人不允許做證——這是歷史對無用廢物的恰當處理，他們因為對抗潮流，被掃到他們罪有應得的地方，只有勝利者才值得傾聽……。」[94]1952 年時，卡耳又於《泰晤士報》上針對柏林 1950 年所撰〈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和其他文章發表議論。

相對的，柏林除了於報紙上對卡耳的指責有所回應外，也在 1953 年〈歷史的必然性〉這個講題中，指名道姓批評卡耳對於道德判斷的敵視，並稱卡耳是「受到馬克思影響而態度強硬的現實主義者」。[95]卡耳自也不甘示弱，隔年，回以〈歷史和道德〉一文。

1955 年 7 月，卡耳辭去牛津工作，前往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擔任高級研究員。臨行之際，卡耳還特意修書柏林，希望能見

94 以撒・柏林，〈柏林致喬治凱南的信〉，收於氏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343；Isaiah Berlin, “A Letter to George Kennan: On Human Digni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43.

9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76~177；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32.

上一面。但此後，卡耳和柏林一在劍橋，一在牛津，生活空間的差距，使得他們兩人既有的學術取向和心靈的差異越來越難以掩蓋。最為關鍵和明顯的，就是卡耳在 1961 年為劍橋大學「崔衛連講座」（Th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s）所發表的數次講演，其中卡耳幾乎是以柏林為主要批判對象，對於柏林的思想毫不留情的指責。這些演講後來匯集成書，亦即在學界中享譽甚久的《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 ?*）。而事實上，這本書出版前後，柏林已在報刊上和卡耳來來回回筆戰了數次。

1966 年 11 月，柏林在給卡耳的一封信中寫道，他明白兩個人知識之路的確不同，但他表明對卡耳的情誼永遠不會改變。柏林說卡耳是一個他不願為了任何原因而破壞關係的朋友。數天之後，卡耳回覆時也提到，柏林在某份雜誌上發表的言詞變得較平和了，他同樣表達自己非常重視兩人間的長期友誼。

展讀這些信箋，曾為摯友的兩位學者心中的悵然與難捨之情，躍然紙上。但是，雙方的表白也恰恰透露出當時彼此緊繃的關係。擺在眼前的情況是，個人的交誼終究敵不過思想的差距以及學術識見的分歧，這兩個曾經相熟的朋友終究還是分道揚鑣了。

研究卡耳的哈斯藍（Jonathan Haslam）認為，柏林對於卡耳有著很深的矛盾情結：

> 他一方面受到卡耳知識力量的吸引，一方面又因此人「缺乏激情和熱切」而困擾……他們由於《旁觀者》（*Spectator*）的評論而相識相熟，不過，在形式上的禮貌謙恭背後，隨著政治情勢的改變，兩人間的衝突因而白熱化。柏林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卡耳是比較傾向於權威主義者，這使他們成為彼此最大的敵人，以致於在卡耳死後，柏林嚴厲地反駁這位昔日的對手之餘，仍時時插入這樣的表白：「但是，我們是最好的朋友。」[96]

其實，卡耳對於柏林何嘗沒有這樣的矛盾之情？

96 Jonatha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1982*, 65.

六、卡耳批判柏林的「道德判斷」說

就道德判斷問題來說，卡耳於 1954 年撰寫的〈歷史與道德〉，[97]篇幅不長，他的思考輪廓卻已具現。日後卡耳只是針對這些觀點另文加以擴充補述，並未再做根本的改變。

卡耳首先從近兩百年來史學的演進談起。他肯定過去的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如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康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馬克思，甚至追求歷史定律的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等，對歷史學的發展貢獻良多；他們努力從過去的事實中建立起次序分明的因果關係，擴增了後人的歷史理解。同時，卡耳也認同先輩們堅信不移的價值：歷史是一個有意義的過程，藉由精湛的探究，可以引領世人知曉通透其中的道理。

卡耳接著歸納上述史學發展下，關於「歷史」已有公認的三個原則：

（一）史家與編年家不同，編年家主要說明一事如何接著（follow）一事而來，史家則強調一事如何導引出（lead）另一件事。

（二）史家必須深入探查的，不是個人的意願本身，而是它們背後那些主導的因素和力量。

（三）歷史儘管不能重複，但仍有某些規律性，史家可以從中得出一些概論（generalizations）。

基本上，卡耳藉由陳述史學的進展以便確立自我觀念的正當性。這一論述模式與巴特菲爾德討論道德判斷的起始如出一轍：他們都訴諸史學的進步，做為發揮立場和觀點的基礎。對這兩位學者而言，百餘年來歷史的諸種變革都是往前的、連續的、進步的，[98]在這過程中因而逐漸

97 E. H. Carr, “History and Moral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7 December, 1954, 821.

98 關於卡耳的進步觀念，Keith Jenkins的*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凝聚關於歷史和史家工作的基本共識。卡耳此處所提的共識，扼要來說即是：史家的工作旨在藉由因果分析，解釋歷史的意義；歷史學家探查的不是個人動機，而是事件之間的關係以及推動個人意願和行為的諸種因素。

以規範史家的職責為引，卡耳向柏林娓娓提問：因果原則和道德責任說，真的難以相容嗎？他舉例說，大多數人既能看穿事件的肇因有來自非個人的力量，但也會同時控訴犯罪者的罪愆。不過，〈歷史與道德〉原為報刊上的讀者投書，受限於版面，卡耳的說理只是點到為止。

饒有意思的是，卡耳對於柏林的論評儘管客氣而自抑（畢竟此時是兩人關係最密切的時候），言語間仍不乏挑釁意味。卡耳如此說道：「大概毋庸說吧！柏林並未拒斥因果論，也應該不會想要退回到過去的那種歷史之中，那種只在意要去告訴大家約翰王是一個壞的國王的歷史。可是……。」讀者不難感受到此段語意下某種欲蓋彌彰的諷刺。接著，卡耳又說：一般而言，會對人類行為訴求道德判斷的多半是神學家或道德哲學家，要不就是政客或尋常之人（common man）；但「歷史家，真正的歷史家（quo historians），不是要去評價，而是去解釋。」至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卡耳似乎不但奚落柏林持有的是落後的史觀，還暗指柏林根本不是「真正的歷史家」！果真如是，這無疑是相當嚴厲的攻訐。

這個疑問須待七年之後始有答案。的確，1961 年的 1 月至 3 月，卡耳在劍橋大學「崔衛連講座」以「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

---

*Rorty and White*有詳細的討論。不過，詹京斯是以「後現代」主義的角度來回顧、評價卡耳，論及卡耳時語多批判。就某方面來說，詹京斯的討論亦未脫「進步」論的觀點。凱斯・詹京斯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76~88；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43-64. 卡耳與巴特菲爾德認定史學基本上是不斷走向進步，這一假設與柏林大有出入。關於近代史學的發展，柏林認為從十九世紀蘭克以來的史學變革，並非一種直線式的演進，而只能說是產生了一種與過去「不同的」的歷史觀點，但未必是「進步的」觀點。詳見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82~386。

為題，連續發表了六次演講，講題中除了更清楚標記自己的立足點之外，尤其對柏林提出嚴苛的抨擊。這一回，他所用的語詞和口氣不再迂迴含蓄，而是直接且不留餘地。

卡耳的演講稍後引來柏林的自我答辯。他在 1961 年 5 月 18 日投書《聽眾》（*Listener*）雜誌，開頭即說：被卡耳點名的威基伍德小姐和卡耳．巴伯（Karl Popper, 1902~1994）教授都已先後有所回應，「我也很願意在此面對卡耳先生針對我而來的一切指控（迄今為止，我是受害於他次數最多、而最不抱怨的犧牲者）。」[99]之後，1962 年 1 月 5 日，柏林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又發表〈卡耳先生的大軍〉（"Mr. Carr's Big Battalions"），他說：「在這些演講的廣播版中，卡耳先生如此禮遇我，他提到我的次數之多（雖然很少是稱讚的），僅次於黑格爾和馬克思。」[100]由此可見，卡耳對於柏林攻擊之甚。吾人今日所見的《歷史論集》，乃由講稿經過刪修成書，即使如此，書中直接、間接指涉柏林的還多達十幾處。若說卡耳實際上是把柏林列為自己講演時的最大假想敵，這一推論並不為過。

《歷史論集》基本上是〈歷史與道德〉一文的延續。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以及許多文章內對於決定論（determinism）的質疑、對於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斷關係的論證，都不為卡耳贊同。早在 1954 年時，卡耳先已揭示他反對史家道德判斷的兩個因由：一為史家應該致力追求因果解釋、追求某些普遍趨勢，以勾勒出歷史的意義；二為史家探討的焦點是更廣泛的非個人因素和力量。如今，卡耳舊話重提，透過連續數次的演說，他有更多的揮灑空間，申論、強化自身的論點。儘管結構上有些鬆散，從《歷史論集》的篇章中還是可以窺知，卡耳主要分從兩個角度切入：歷史與科學的關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證成己說。換言之，柏林與卡耳的爭論，已由「道德判斷」延伸到更廣泛的「歷史」問題上了。

99 Isaiah Berlin, "Letters to the Editor: What is History," *The Listener*, 18 May, 1961, 877.

100 Isaiah Berlin, "Mr. Carr's Big Battalions," *New Statesman*, 5 January, 1962, 15.

七、柏林與卡耳的「歷史」之戰

從 1950 年代初期柏林和巴特菲爾德的論辯中已可看出，「道德判斷」其實所涉及的絕非單一層面的史論而已，而是關乎歷史這門學科知識的種種。卡耳與柏林之間差異的背後，同樣是兩種歷史概念的對峙，《歷史論集》即清楚呈現了他們兩人在史學關鍵問題上的背離。

（一）歷史與科學的關係

回顧柏林的思考邏輯中，因為個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歷史的發展不可能決定於任何法則或規律。同樣的，史家面對歷史時，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觀和直覺，歷史固然與想像文學不同，與科學的差距更遠。

柏林認為歷史學無法如某些天文學或地質學那樣，一旦獲有先行條件，就能信心滿滿地重建。柏林在〈現實意識〉中說：

> （關於回到過去這件事）無論如何，很清楚的是，這樣的重建（過去）就算是具有高度技巧的、細緻的、極盡完整的，也無法達成其基本目標：重建某些過去文化的原樣。這完全不可能的最明顯原因是：因為人的知識容易有誤，因為人們是從後來的立足點去注視過去的黃金時代，而這與十四世紀的倫敦人採取的角度不同……。不管這些問題如何得到完善的克服，結果將還是一個很奇怪的人為製品……。[101]

由歷史學先天知識上的限制著眼，柏林指出歷史永遠是後人所建構，人的知識又必然有誤，因此所重建出的「過去」永遠和彼時的「過去」不等。而歷史和科學的差別不只如此，柏林還認為歷史專注的課題和科學不同，「差異而非相似才是……構成歷史描述的完整性……。」也正因為歷史家關注獨特和不重複之事，所需能力也與科學家大大有別。柏林看到史家亟待發揮的是想像力、洞見，俾讓讀者從歷史敘述中獲得一種

101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14.

真實感（a sense of actuality）。

柏林沉思歷史的致知方式、研究重心以及研究能力，他駐足於科學的對立面，捍衛歷史的獨特性。在科學與文學藝術兩個選項間，柏林更接近的是文學史家的觀點。但卡耳卻反向而行，他認為史家的工作在於分析和論證，他戮力追求的是拉近歷史與科學的距離。

卡耳也從歷史研究的方法入手，他指出歷史學家使用假設和科學的使用情況大致相同。他說：科學家提出的論題其實只是假設，「他們所希望的是從一個假設到另一個假設的逐漸進步；用解釋來分辨事實，而又用事實來測驗解釋；因此自然科學家和歷史家所走的路線，在我看來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102]其次，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卡耳更認為歷史學不是只講特殊，它也有一般化的特性，因為歷史學家所用的語詞，如「革命」、「戰爭」，即具有一般化的傾向，職是之故，歷史「就不得不走向一般化」。[103]而儘管歷史研究的成果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卻不能說歷史知識沒有任何參考的價值。總之，在卡耳看來，「……無論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他們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基本上是大致相同的。」[104]

卡耳與柏林其實都從歷史知識建立的過程以及歷史知識的特性陳述己見，但他們的著眼卻是南轅北轍。一強調科學化，一強調文學性；前者看到歷史學家也在尋找一般化的歸納，後者確信歷史家鍾情於個別的現象。就這點來說，兩位學者的對立可視為英國史學傳統中文學、教育的歷史與科學、學院的歷史長期爭逐的延續。柏林近於文學史家的聲言，而卡耳在論述之間，理所當然地視歷史為社會科學的一環，且與自然科學的求知有異曲同工之妙。

---

102 愛德華・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68），54；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61.

103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56；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63.

104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62；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69-70.

（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前已述及，終生堅持個人自由抉擇的柏林，自然是傾向「個人意志」確實存在、個人力量的不可抹煞這一端。[105]卡耳的立場同樣鮮明不過，他要彰顯的是個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居。他說：「歷史事實固然也確是有關個人的事實；可是，它並不注意個人單獨的行為……歷史事實所注意的是一個社會中個人彼此間相互的關係和社會力量。」[106]以下這段話更可看出卡耳的意向：

> 「歷史」一詞含有兩種意義，一是歷史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是他所研究對象——過去的事實。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來看，歷史都是一種社會的過程，在這過程裏個人的身分是社會動物；至於社會和個人間那想像的對峙僅足以混亂我們的視聽。[107]

正因此，卡耳得到類似巴特菲爾德的結論：為分析歷史現象、解釋歷史發展過程時，必須跳過個人的動機和意志，直探那些更複雜的社會環境力量。他高聲呼籲「讓我們拋棄歷史家是法官定罪的觀念，而集中我們的注意力到一個更困難但更有益的問題上，就是論事而不必論人，這才是歷史家的急務。」卡耳引用馬克思・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話：「歷史家應該批評的是制度，而不是創造制度的人。」[108]

至於說到「歷史和道德」一事，卡耳如此表明：「歷史家對個人的私生活無須置評……因為歷史家和倫理學家的立場不同」，「我們知道，巴斯德（Pasteur）和愛因斯坦兩人的私生活都足為人師表，甚且可稱為聖人。但假定他們都是不忠實的丈夫、暴戾的父親……難道會減少他們

105 關於柏林對於「個人意志和社會因素」問題的看法與立場，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處理，此處不擬再述。請參考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 期，393~399。

106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44；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52.

107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4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55.

108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70；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79.

在歷史的功績麼？」[109]所以卡耳下結論說：「歷史家卻不必撇開正題，去批評個人的私生活。」[110]

以上所見，卡耳試圖以歷史和科學的相近，闡述史家的工作重在解釋而非評價；他著墨社會與個人的關係，藉以論證歷史解釋無庸在意個人的意志，更不需對個人私德多加置喙，而應該注重社會的集體因素。這些是他堅拒道德判斷的立論根據，也是他隨後批評柏林的出發點。

卡耳首先指責柏林反對因果解釋之不當。卡耳說，歷史學家的第一個特質是對一件事提出多面的原因，然後「……這些原因先後排列，按照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來建議一個系統；判斷哪一個原因或哪一類原因……應被視為『終極原因』……。」而柏林不但抗拒這種因果推論，且鄙視這類分析方式是受到黑格爾和馬克思決定論的影響。[111]

但卡耳認為更不可取的是柏林的道德判斷說。《歷史論集》的第二章「社會與個人」內，卡耳提到柏林「數年前發表了一篇動人而受人歡迎的論文『歷史的必然性』……，整篇文章嘲笑那般深信歷史的決定因素是『巨大的非人力量』的人們……。」[112]卡耳聲稱這是一種所謂的「惡王約翰式歷史觀」（Bad king John Theory of History），「意指歷史上值得注意的是個人素質和行為」。

面對這樣嚴厲的指控，柏林隨後寫了一篇短文投在《聽眾》雜誌「給編者的信」專欄上，強力駁斥。柏林說他未曾主張過「歷史家不應該尋求人類行為的背後因素」，以及「歷史家的積極任務是對所討論的當事人貼上好和壞的標籤」，這些都是卡耳的附加之罪。柏林甚至說，這兩種看法太過天真和怪異，他懷疑時至今日還有誰會信持這類論點。之後在 1960 年代末期，柏林為《自由四論》而寫的序論中，又再次釐清：他從沒有宣揚「道德化」（to moralize）是史學家一項積極的責任，那是卡

109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6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75.
110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68；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75-76.
111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81~83；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89-90.
112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44-45.

耳硬栽在他身上的觀點。柏林說，他僅是主張「歷史學家也和其他人一樣，都在使用一些帶有評價色彩的語言」。[113]

平心而論，卡耳的批評確有過當之嫌，而把柏林的論點推向了極端。在柏林與巴特菲爾德的論辯中，我們已然看出，柏林的「道德判斷」概念並無「道德化」歷史之意。他的兩個主張之一：歷史解釋不可偏廢，不應完全抹煞個人的責任，這點確實讓卡耳無法苟同。但值得注意的，柏林的另一個論點：史家記述歷史時不可能完全去除價值立場，卡耳也持有類似之見。《歷史論集》第一章「歷史家與事實」中，卡耳一再強調「事實」的重要性與意義全然取決於史家的觀點，例如他說：「歷史家是『現在』的一份子，而事實則屬於過去。歷史家和事實是不可分的。沒有事實歷史家就失去他的基礎，而沒有歷史家去解釋，事實也不過是死的、沒有意義的。」[114]卡耳在此無異於承認史家的價值評斷必然存在。就這點來看，卡耳與柏林的思想並非如表面所見一無交集，只是不知兩位當事者彼時曾否見及於此。

或許，對現代史學研究者而言，論及「歷史」，很容易就能找出文學性和科學性兩種歷史態度的折衷之道，也很可以輕易判斷柏林和卡耳的意見並非不能相容，甚至能了然於他們之間的爭論正暴露了個人的價值立場是史家面對過去的永恆難題這一事實。或許，因為遠離那個勢不兩立的年代，我們可以輕鬆以待，目光清明。但是，身在彼時歷史風暴中者，即便如當代鴻儒柏林和卡耳，似也難有超越時空的意識。對當時的兩人來說，尤其是卡耳，這場思想之爭如同水火，難以轉圜。

不妨注意卡耳的批判風格。早在 1954 年時，卡耳就已暗示柏林持有「惡王約翰式的史觀」，只是事隔數年，他的詞鋒更利。卡耳說：「惡王約翰式的史觀」「原是初期歷史意識上的一個特質……但在今天我們

11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6、26；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7, 21.

114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23；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0.

就會覺得它太幼稚和不成熟了。」[115]將柏林冠上「惡王約翰式的史觀」，卡耳恐怕真正要表達的是，柏林的看法已經落伍過時，那是屬於過去單純社會的遺留物。

不單如此，卡耳又另外把「個人論個人」的歷史解釋，諷為「通俗歷史觀」（common-sense view of history），並影射柏林、威基伍德以及和柏林有忘年之誼的費雪皆持有這類觀點。[116]事實上，「通俗歷史觀」倒頗為符應柏林對史家的看法。柏林始終認為，歷史家就如常人一般，不可能完全剔除主觀和價值判斷。與此相反的是，卡耳卻似乎極力要把史家和凡人區分開來，讓史家超越通俗，獲得某種特殊的身分。

從「惡王約翰式的史觀」到「通俗歷史觀」，卡耳劃清界限之意，在這些用詞中表露無遺。他既以進步論的心態，把柏林的思考貶抑至最簡單、原始的地步，以別於他本身的現代和進步。他更把對手歸類為「通俗」之見，藉此映襯自己的專家身分。在《歷史論集》中，卡耳經常把柏林和威基伍德劃為同類，因為他們都不是「歷史學家」：

> 有些歷史家——尤其一些雖有歷史著作而非歷史學家——就屬於這「文學思想家」（literary intellectuals）之類。他們急於告訴我們歷史不是科學，替我們指出什麼是歷史不能或不應作的，能作或應作的，卻沒有時間來檢討一下歷史已有的成就和將來的可能。[117]
>
> 只不過柏林是一位受人歡迎而有廣大讀者的作家。因而最近五、六年來，無論在英國或美國，無論什麼人寫一篇有關歷史的文章或評論一本歷史書，都對黑格爾和馬克思以及他們的『決定論』予以譏諷，並指出不承認歷史上有突發的事件乃屬荒唐。我們將他學生的這種缺陷歸罪於本人或許不太公平。因為即使他說的毫無意義，那種認真而又動人的態度卻不能不使我們原諒他。但他

115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45.

116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27；E.H. Carr, *What is History?*, 35.

117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7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85-86.

> 的學生們重述他的話就不像他那樣吸引人了。無論如何，柏林所講的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118]（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卡耳的評比中，柏林充其量只是有歷史著作的「文學思想家」、「作家」之類。不妨回溯半個世紀前，伯里和崔衛連爭辯的時代，「文學史家」無論如何還是歷史圈中的一員。1950 年代初期，巴特菲爾德猶能容許那些達到淨空自己、不以己意凌駕歷史事實的文學史家的存在。但至卡耳，他卻要在「真正的歷史家」（1954 年卡耳的用詞）和「文學思想家」之間豎立界碑，把後者逐出歷史家的門牆之外。

換言之，卡耳意欲劃清的恐怕不只他和柏林之間，更是「歷史」和「非歷史」、「專家」和「俗人」之間的分際。對他來說，這場歷史的爭論彷若某種生存競爭，似乎關係著誰能在歷史的尖峰站穩腳步，誰將敗陣下來，淹沒在歷史的浪潮當中。或正因此，卡耳對於柏林的批判用詞幾近刻薄，激得柏林也不甘示弱回敬以：「卡耳先生展示給我們看的是，他如何處理思想史上一個最深刻和最令人頭痛的議題，這倒不是件壞事。他的文理總是清楚、嚴謹……但是他處理個人自由和責任的問題，卻不走正道。我們由此得到警示，也就是任何人不管多麼博學多聞，一旦冒險進入一個離他太遠的領域，結果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119]兩人終究免不了意氣用事。

問題是：1950 年代柏林始終以歷史學家的立場發言，興致勃勃縱論歷史，毫無猶豫或覺不妥之處。然而他的好友卡耳不但反駁他的史學觀點，更全然否認他的歷史家身分，將他劃入文學思想家和作家之流。卡耳如此「歸類」，究竟應該看成純粹是一種辯論策略，或另具深意？

也許從二十世紀中葉英國的史學趨向的脈絡來審視，卡耳面對「文學思想家」柏林的強勢態度，以及他自居為「真正的史家」的理直氣壯，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釋。

誠如伊格爾斯（Georg Iggers, 1926~）所說，二十世紀上半葉史學的

---

118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83~84；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92-93.

119 Isaiah Berlin, “Letters to the Editor: What is History,” *The Listener*, 18 May, 1961, 877.

主要趨勢是由十九世紀的強調敘事史和敘述事件，逐漸轉為以社會科學為模範的研究取向和寫作方式。也就是說，歷史探究的重心漸次從個人的歷史作用及其動機，移轉到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的歷程。[120]當然，此一變化在英國史學上的步調相當緩慢。依據帕克的研究，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英國歷史思考的核心依然是傳統的個人主義，對於模式和概括式的綜合解釋尤其抱著敵視的態度。[121]儘管如此，社會科學的影響還是有跡可尋。例如 1930 年代與柏林結為摯友的希爾（Christopher Hill, 1912~2003）即曾嚴詞批判柏林另一位忘年之交費雪，說他所寫的《歐洲史》使用過時的二手史料、否定經濟因素的解釋，且把歐洲的問題窄化為道德和政治的問題。[122]當然，如前所述，希爾的聲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文學化的歷史著作仍然擁有廣大影響力的形勢下，想必並非時時可以聞見。

無論如何，從長遠來看，這股靠向社會科學的史學潮流似乎勢所必然。尤其約自 1950 年代中期之後，運用理論和模式的傾向在英國史學界中加速擴展。[123]例如創始於 1952 年的《過去與現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這份期刊上，屢見包括馬克思史學家在內的各派學者，熱烈爭辯社會與文化角度的歷史研究，此應是標誌著崔衛連時代的英國「社會史」，已逐步被更講究問題分析的「新社會史」所取代。至於那些日後聲望甚高的馬克思派史家，如霍布斯邦、湯普森等，也多在 1960 年代開始嶄露頭角。

---

120 伊格爾斯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4~5；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4-5.

121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177.

122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129.

123 伊格爾斯認為有幾個因素導致英國史學尤其是經濟史發展領域的變革：新的社會科學獲得學術地位，而且長期以來的研究，促進了人們對於這些新學科的理解；電腦的運用；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大學迅速增加，有益於新知識的傳播和接收；1950 年代以後，英國許多學者脫離共產黨，在爭論和立場上較不受黨派意識和嚴格意識形態的影響。參見 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1.

卡耳的《歷史論集》正是形成於這樣的氛圍當中。他對於歷史科學化的自信以及批判文學史家的決然，恐怕都與此時史學的走向愈益明朗有關。或即因此，卡耳和柏林的筆戰，雖名為「道德判斷」的論辯，其實當中還隱隱夾雜著一股誰是「真正的歷史家」、「誰的歷史觀才為正統」的氣味。

面對這股史學的趨向，柏林和卡耳最大的不同在於柏林選擇了「逆流而行」之路，[124]力圖為「個人」——無論是過去歷史中的個人或史家個人的自主判斷，保留些許餘地，而卡耳則是積極迎向，立足此一史學之洪峰。儘管兩人的思想並非全無交錯之處，在此背景下，他們之間的爭端卻似乎演成僵局，難有妥協的餘地。

結論：柏林不再是「歷史學家」

回顧英國史學的歷程，十九世紀的卡萊爾、麥考來和二十世紀的崔衛連，都是作品深受大眾喜愛的歷史著作家。但在後世學者的評價中，他們經常被貶抑為「非專業歷史家」之列。馬威克（Arthur Marwick, 1936~2006）說：「麥考來時有不符合歷史家身分之處」，「比起麥考來，卡萊爾甚至距離一般認定的歷史專業資格這個圈子更遠」，[125]至於崔衛連，馬威克以他曾有二十多年時間離開學院圈子這件事做為依據，將他歸為「業餘史家」。[126]此外，辛梅法柏（Gertrude Himmelfarb, 1922~）在《新歷史和舊歷史》（*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第八章〈現在誰還讀麥考來〉內如此說：「我們今天受邀來思考這些歷史家，多半不是把他們看成是為英國的過去記錄下重大事件的歷史家，……而是視他們為一些

124 在此借用柏林的論文集《逆流而行》（*Against the Currents*）之名。Isaiah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5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44-45.

126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59.

在歷史作品中反映出專屬於那個時代的思想和態度的維多利亞人。」[127]

現代學者以「專業」時代的標準將過去史家分門別類，至為常見。但所謂「專業」和「業餘」之名起於誰的界定？崔衛連對自己時代中的科學化史學趨勢只是稱以「學院的歷史」，以有別於自己所屬的「文學的歷史家」，他顯然並未將自己排除在「歷史界」之外。因此，另一個值得思考的面向是：卡萊爾、麥考來和崔衛連如何定位自己？同時代人又如何看待他們？當時的「歷史」意義是什麼？這樣的探究方式同樣適用於柏林這位大多數人眼中的思想家。

當今學界多半不認定柏林是「歷史學家」，而更傾向於把他定位為「思想家」，但 1950 年代當柏林告別純哲學研究而踏入觀念史領域時，他的確以歷史學家自居。在後來的十餘年內，柏林更是全然浸潤於當時的歷史文化圈中，熱切論說歷史，積極回應當時重要歷史議題的討論，並與巴特菲爾德、卡耳論說「道德判斷」，爭執歷史要義。對柏林而言，歷史是一個可以自由進出的領域，而非高牆深院的「專家之學」。然而，就在柏林縱筆論史之際，英國史學潮流所趨日益明顯：延用理論、重視分析、追求結構面的歷史解釋，這些都與柏林的思考路向越來越遠。柏林的尷尬處境，或也不難想見。

但不應忽略的是，柏林曾經試圖扭轉時局，宣示自己的史觀。他和巴特菲爾德、卡耳辯證「道德判斷」與歷史論題，強調歷史解釋不能漠視人的自主性，而單只探尋外在力量的作用，亦即史家應該適度論評個人應負的責任。此外，史家所用的日常語彙，必定內含某些價值立場，史家不可能完全達到價值中立。在歷史與科學的關係上，柏林力主兩者的差別，而非兩者的相近。他宣稱史家應該專注於差異和特殊面，並以敘述、傳達過去中的具體面貌為業。他認為史家連綴事實、呈現過去的景象，不能倚靠科學家的邏輯和抽象思考，而是要藉由想像力、洞見以及生動的敘述達成。

如果欲從英國史學的脈絡中為柏林的歷史思想定位，那麼柏林顯然

127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145.

近於英國近代史學中淵源深遠的「文學史家」這一脈，而力拒「科學的歷史」觀的日益倡行，無論指的是十九世紀以來的自然科學或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科學。誠然，隨著社會科學對治史方法的影響日深，此一史學「專業化」的方向愈益明確，柏林的史觀必然面臨挑戰。他與卡耳從密友而翻臉為敵，應可視為是他史學困境的一個寫照。從 1960 年代卡耳質疑柏林的「史家」身分當中，多少說明了 1970 年代後，柏林數度聲明自己不是歷史學家的可能原因。

另一方面，柏林對歷史的看法或許與二十世紀中葉某些追求「專業」的史家意見有所分歧，但從他和巴特菲爾德以及卡耳的「對話」過程裏，我們看到這些學者的思想之間不盡然全然對立。柏林與巴特菲爾德俱皆看重歷史的「傳達」和「呈現」功能，雖然兩人對於史家的價值立場有著不同的思考向度。柏林認為史家在敘述和表達上難以摘除內含的價值判斷，這點體認和巴特菲爾德的期待不同，倒與卡耳論證史家與事實的關係時頗有相通之處。但是，時代的情勢似乎讓當局者無法看出這些可能化解爭端的所在。

為柏林寫傳的伊格納蒂夫說：1960 年代的柏林獲得一種獨特的名聲，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哲學家，而是兩者的奇特結合，「這種方式，使他獨具一格」。[128]柏林因為以歷史的角度研究思想的興趣，選擇離開哲學領域，轉入歷史的探究。但在史學之路上，他的觀點卻又與當行的趨勢相悖。柏林曾說：「孤獨並不意味著你遠離其他人。孤獨意味著別人不能理解你在說什麼。」或許他對自己在哲學、歷史學界中的「逆流而行」並非毫無所感。

（責任編輯：李修平　校對：徐熊書晨、馮卓健）

128 邁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372。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思想的瀚海》。臺北：正中書局，1994。

以撒・柏林著，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以撒・柏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現實意識》。臺北：臉譜出版社，2004。

伊格爾斯（Georg Iggers）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臺北：昭明出版社，2003。

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

帕特里克・賈蒂納（Patrick Gardiner）著，江怡譯，《歷史解釋的性質》。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

林慈淑，《一個文人英雄的誕生——卡萊爾的思想與時代（1830~1840）》。臺北：稻香出版社，1998。

柯靈烏（R. G. Collingwood）著，陳明福譯，《柯靈烏自傳》。臺北：故鄉出版社，1985。

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

愛德華・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1968〕。

邁克・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臺北：立緒文化，2001。

Appleby, Joyce.,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4.

Berlin, Isaiah.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Berlin, Isaiah.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Berlin, Isaiah. Henry Hardy ed.,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7.

Berlin, Isaiah. Henry Hardy ed.,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2.

Butterfield, Herbert.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Butterfield, Herbert.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Carr, E. H.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Collingwood, R. G.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ollini, Stefan. *English Pasts :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ardiner, Patrick.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eyl, Pieter.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Groningen: J. B. Wolters, 1955.

Hardy, Henry. ed., *Isaiah Berlin: Letters 1928-19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aslam, Jonathan. *The V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1982*. New York: Verso, 2000.

Himmelfarb, Gertrude.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ghes-Warrington, Marnie.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Iggers, Georg. G..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Iggers, Georg. G..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1997.

Ignatieff, Michael. *A Life: Isaiah Berlin*. London: Vintage, 2000.

Jenkins, Keith.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Kenyon, John. *The History Men: The Classic Work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93.

Marwick, Arthur.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Meyerhoff, Hans.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Parker, Christoph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0.

Tucker, Aviez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4.

Wedgwood, C. V. *Velvet Studies*. London: Alden Press, 1949.

Wedgwood, C. V. *The Sense of the Past: Thirteen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7.

二、論文

林慈淑，〈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臺大歷史學報》，36期，2005，臺北。

Berlin, Isaiah. "Letters to the Editor: What is History," *The Listener*, 18 May, 1961.

Berlin, Isaiah. "Mr. Carr's Big Battalions," *New Statesman*, 5 January, 1962.

Berlin, Isaiah,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7.

Bury, J. B.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Carr, E. H. "History and Moral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7, December, 1954.

Cracraft, James. "A Berlin for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41, October 2002, Middletown, Conn..

Trevelyan, M. G.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Vann, Richard T.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in Frank Ankersmit &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Peaktion Books Ltd, 1995.

Vann, Richard T. "Historians and Moral Evalu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43, Theme Issue 2004, Middletown, Conn..

Wedgwood, C. V. "History as Literatur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6 January, 1956.

三、以撒・柏林的書信

現存放於英國牛津大學波得林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現代文件處」（Modern Papers），並由「柏林文件信託公司」（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受託整理和出版中。

Isaiah Berlin's Dispute with Historians over "Moral Judgment": Spur to Develop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ography

Lin, Tzu-shu*

Abstract

This article opens access to the historical ideas of Isaiah Berlin (1909~1997) by exploring the Berlin's arguments with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and Edward. H. Carr (1892~1982) over the questions of moral judgment and what history is. By examining their discussions and disputes over these questions, I offer a glimpse of Berlin's intellectu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principal English historians of his time. Additionally, this inquiry sheds light on some major develop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ography, such as the place of moral judgment, the long struggle between literary historians and scientific historians, as well as key features of the "professionalism" trend in historical inquiry in England.

Keywords: Isaiah Berlin, Moral Judgment, English Historiograph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